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 与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

王 双

【内容提要】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危机诱发机制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度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东盟无论从自身能力和意愿上，都无法为东亚区域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区域合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出现重大进展，三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发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作用，成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本文试图阐述金融危机下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以及中日韩三国在金融、贸易、能源、环保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为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 区域性公共产品 区域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综述

(一)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公共产品属于经济学范畴，是指一种商品、服务或资源，一方的消费并不妨碍他者的消费。萨缪尔森最早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阐述了其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性质，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限于国内层面。^①针对国际

^①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问题的“公共产品”概念的运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①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美国经济学者曼瑟尔·奥尔森于1971年最早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这个概念，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供应中集体行动的困难问题。

20世纪8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学，此后在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学者们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跨政府间的合作上。^②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出现，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又逐渐分化为区域性和全球公共物品两类。1999年，卡尔、坎布尔等人将公共产品与其他产品以及不同的公共产品作出区分。^③此后，定义区分愈加分明，以适应不同的政策建议所需。区域性公共产品一般是超出单个国家而在某个区域内可以共享利益的一种产品，是介于国家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形式，根据问题衍生出的溢出效应，范围可以从相邻的国家到一个大洲甚至一个半球。在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区域性公共产品在健康、环境、金融稳定、基础建设和安全等领域中重要性日增，成为区域和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定义不一，本文不再试图界定，仅廓清需要分析的一些类型和领域范围。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性质来区分，可以大体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俱乐部产品由于不完全符合“非排他性”，故属于非纯公共产品的一种，而合作产品则有可能是纯公共产品，也有可能是非纯公共产品（参见表1）。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p.387-389.

^①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December 1968, pp.1243-1248; Bruce M. Russett and John D. Sullivan, “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4, 1971, pp. 845-865.

^②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Mayer, Volker Rittberger and Michael Zurn, “Regime Theory: State of the Art and Perspectives,” in Volker Ritt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Ign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Global Public Goods: Concept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0-451;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and Kevin M. Morriso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DC Policy Essay No. 25, May 1999, p.63.

表1. 区域性公共产品类型：^①

类型	纯公共产品	非纯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品	合作产品
区域性公共产品	疾病防治 病虫害治理	疫苗项目 酸雨治理	共同市场 扩展服务	维持和平 清理水体

(二)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区域合作

1. 区域合作中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困难与问题

找到一条解决地区间一同分担负担和分享利益的方法实属不易。影响区域合作的困难和问题很多，如国家经常由于国家尊严、政治的紧张关系和很高的协调成本等原因不愿意合作。涉及公共产品供给，论述最广泛的有：

(1) 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集体行动，国家可以减少合作的成本以得到公共产品。然而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集体行动往往会很困难，对集体行动悖论的论述从奥尔森开始从未停息，有大量文献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②

(2) 缺乏信任。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少信任，如果邻国之间由于过往的矛盾互不信任，它们就不会达成区域的合作，因为双方都在寻求获得最大的区域性公共产品。^③国家有很强的战略性的一次性谈判的动机从而使其他国家无法在谈判中获得稳定的安全预期和收益保证。这种战略无法带来溢出效应，最终只会导致各方都受到损失。

^①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and Kevin M. Morriso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DC Policy Essay, No. 25, May 1999, p63.

^②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December 1968, pp.1243-1248; Mark Irving Lichbach, *The Cooperator's Dilemm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Garrett hardin, "Dilemmas and Taboos," *The Environmentalist*, Vol.4, No.4, December 1984, pp.287-293;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odd Sandler, "Global and Regional Public Goods: A Prognosis for Collective Action," *Fiscal Studies*, Vol.19, No. 3, 1998, pp.221-247.

^③ Maurice Schiff, L. Alan Winter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72, July 2002.

(3) 机制的创建与维持。罗伯特·基欧汉在其著作《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论述了机制对国际合作的作用以及机制的创建和维持的困难等问题，^①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分析了区域机制对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分配的重要性，适当的机制安排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作出决策的成本，从而减少交易成本。^②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国际组织和地区一体化协议对加强区域国家间的信任和区域合作的积极作用。^③

(4) 筹资和利益的分配问题。^④该问题往往与前三个问题紧密联系。

此外，还有缺少重要的领导与发起多边谈判的国家，目标、利益、成本的不明确以及国际机制中最常见的搭便车问题等问题也会影响到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2.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区域合作

区域性公共产品可以解决单个国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解决这种问题的成本比直接利益要大的问题上。区域性公共产品本身带来了集体行动所需的跨国间的外部性和动机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间通过合作以获得单独行动所无法获得的，或是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获得利益。^⑤

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产生信任，为国家间构建起未来合作的起点。公共产品使地区经济融合达到规模效应，促使国家的生产和发展。区域性公共产品支持国家经济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努力。或许更重要的是，区域性公共产品鼓励受益国国家开放，更好地就本国的优势与全球发展目标结合。^⑥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3-103页。

^② Todd Sandler, "Demand and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Antoni Estevadeordal, Brian Frantz, Tam Robert Nguyen, *Regional Public Goods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blications Section, Washington D.C, 2002, pp.11-30.

^③ Maurice Schiff, L.Alan Winter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72, July 2002.

^④ Todd Sandler, On Financing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2638, July 2001.

^⑤ Kea Wollard,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RPG Program*,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Programs Depart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June 2007.

^⑥ Antoni Estevadeordal, Brian Frantz, Tam Robert Nguyen, *Regional Public Good: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blications Section, Washington D.C, 2002.

典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需要包含溢出效应集团的所有参与者的跨国集体行动，也可能由一个或一些主导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更广泛的目标来提供。^①本文重点讨论国家行为体在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角色和地位，进而分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区域性公共产品可以根据提供者的特点和供应方式分为四类^②，如下表：

表2.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③：

供应方式	简单累加 (Summation)	最优环节 (Best-shot)	最弱联系 (Weakest-link)	加权总和 (Weighted -sum)
最有影响 供应者	全体平均	最强（大）者	最弱者	利益最 关切方
区域性公 共 产品	生态环境保护 减轻水土流失 病虫害治理	农业研究发现 疫苗项目 共同市场	交通网络 水体污染治理 疾病防治	能源网络 酸雨治理 和平维持

从属于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包括稳定的金融体系、开放的市场、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等问题，从上图可见，这些多属于“最优环节”的提供方式，即契合本文对东北亚三个最有实力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分析。

^① Marco Ferroni,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e Comparative Edg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February 2002, p.2.

^② 关于四种类型的界定和区分参见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and Kevin M. Morriso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DC Policy Essay No.25, May 1999, pp.65-69; Todd Sandler, “Demand and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Antoni Estevadeordal, Brian Frantz, Tam Robert Nguyen, *Regional Public Goods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blications Section, Washington D.C,2002, pp.18-20.

^③ 据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and Kevin M. Morriso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DC Policy Essay No.25, May 1999, p.66 图表修改。

二、中日韩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一) 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

近年来,东亚区域由于东盟的核心推动作用乏力、合作理念的分歧以及组织泛化导致的凝聚力下降、制度建设的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在东亚,市场主导和危机诱发机制下产生的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和需求,是地区国家间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维系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美国霸权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衰微与地区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增长的矛盾突出。

在东亚地区“东盟+3”的合作框架中,东北亚“3”的合作落后于东南亚“10”的合作。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两个东亚区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地区合作中虽然有着较多共同经济利益和经贸合作,但政治的互不信任和历史的纠葛等复杂因素严重阻碍它们通过“最优环节”的方式合作为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作为领导者的东盟也是力所不及。东盟国家大都采取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政策,国内市场狭小、消费不足,只得依靠美国和欧盟的市场,服从欧美主导的国际贸易与市场规则。由于本地区缺乏发达的外汇市场和健全的金融体系,东亚国家在遭受金融冲击时毫无有效应对之策,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无法保证地区金融体系稳定。

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衡、不对称状态已成为障碍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的重大羁绊,迫切需要地区国家特别是实力较强大的国家之间积极合作,并主导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

(二)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日韩三国合作新进展

在区域合作中,大国之间可以在发起多边议程、推动机制建设与完善以及解决小国所无法解决的诸多外部性问题上进行协调,以推动区域合作进展。全球金融危机中中日韩三国合作有了新进展,同时也推动了区域合作的进展。

国际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却也给中日韩三国提供了加强合作的动力和机遇。为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韩国的积极推动和中日两国的积极响应之下,经过2008年10月中日韩与东盟领导人会议、2009

年4月的进一步协商，在2009年12月28日，东亚和东南亚14个经济体（“10+3”和香港）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拟据此成立一个1200亿美元的紧急基金，这标志着《清迈倡议》的成熟以及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巨大进展。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历程相似，危机诱发机制又一次促使区域各国加快金融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步伐。

2008年12月13日，在金融危机影响加剧的背景下召开的中日韩三国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三国合作将本着公开、透明、互信、互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方式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这确立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并向机制化迈出重要一步。

2010年4月29日至30日，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会议发布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文件，三国就提升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达成多项共识，提出了到2020年应该实现的具体目标和远景。中日韩领导人同意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促进三国合作的机制化进一步发展。在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方面，将努力在2012年之前完成于2010年5月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此外还将在贸易、投资、财政金融、能源、环保、科技与创新等广泛的经济领域内进一步合作与磋商。在金融危机中，三国更深刻地意识到，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融合，是抵御经济波动冲击最有效的保障，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的逐步机制化，将大大推动三国经济合作与融合的水平，彰显三国在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日韩经济合作必要性

三国人口15亿多，占东亚地区人口的71%，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庞大市场。三国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地区的78%以上，出口贸易总量占地区的62%，^①综合数据显示，东北亚三国的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心，具有充分的实力和条件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

日本曾经一度充当了亚洲经济的领头雁，其生产技术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带动了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日本提供区域性公

^① 据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p.145、171、p.228 数据计算。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主要表现为‘加权总和’和‘最优环节’。”^①进入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力不从心。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但为地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渠道，稳定的人民币汇率还在金融危机中对区域国家起到了减缓金融动荡风险的作用。中国的崛起为地区经济稳定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中逐渐成为一个“最优环节”供应者。

在当前的条件下，单单依靠中国或日本不能完全满足东亚国家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日本须继续承担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具有较强实力的韩国也要与中日通力合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连通和协调作用，共同为地区的安定与繁荣承担责任。“公共产品的提供代表了一种超越了国家基础的国际援助的新原则，因为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不但是产品提供者自身的利益需求所在”，^②而且可以惠及地区其他国家。中日韩三国通过合作不但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互不信任，还可以建立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制度基础，共同负担“搭便车”所造成成本增加，减少其对区域合作产生的负面效应。

三、中日韩经济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

（一）金融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稳定的金融体系

稳定的汇率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的金融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使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维持着稳定。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长期盯住美元使本国汇率无法准确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弊端，导致大量的外国投机资本的流入，严重冲击了过度开放的金融体系。固定的汇率政策牺牲

^① 贺平：“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评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120页。

^② Marco Ferroni, “Reforming Foreign Ai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perations Evaluation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0;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and Kevin Morrison,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Policy Essay, No.25,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99; Todd Sandler, *Global Challenges: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 Jayaraman, ajshri and Ravi Kanbu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Case for Foreign Aid,”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m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18-435.

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自由，还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如韩国由于经常性账户赤字的恶化和外国投资的资本抽逃，韩元从2008年7月到2008年底贬值了29%，股票价值跌去了35%，^①这固然暴露了韩国脆弱的金融体系问题，更凸显出东亚地区内稳定的金融体系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稀缺以及建立地区金融合作与救助机制的迫切性。

加强东亚各经济体在汇率安排领域的合作是东亚金融货币合作的核心内容。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单个国家不能够保证地区货币的稳定，地区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地区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汇率政策，使地区的货币体系保持平稳而有弹性。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指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可以从向更加灵活的汇率的转变中获益。减少外汇市场大规模的干预下导致的汇率的过度僵化，可使汇率更多相对于经济基本面而动，并有助于经济体内部资源对需求的重新平衡。区域国家的外汇政策协调可以降低区域国家相对邻国贸易竞争得失的关注，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汇率的灵活性”。^②

“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霸权地位得益于其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的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以及世界上缺乏可替代的国际货币。”^③以美元为本位的金融体系是地区金融动荡的罪魁祸首，要想摆脱这种状况，东亚地区国家必须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与创新。亚洲金融危机后，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探索如何改变美元本位的地区金融秩序。比如，威廉姆森提出东亚可以创造一种反映地区内贸易情况（而不是以贸易主导货币）的货币篮子，从而有利于名义货币汇率的稳定，减少贸易变化造成的各国汇率波动。这种方式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各国的贸易结构，在美元和日元之外，给人民币和韩元等货币以足够的分量。^④有中国学者设想创造一个新的货币单位：亚洲核心货币单位(ACCU)，它可以由少数几种货币如人民币、日元和韩元组成。亚洲区的其他国家货币可以盯住这个新的货币单位。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因为这三种核心货币是由三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东亚区域内规模最大的三个市场作为后盾，而且它仅仅需要三个国家之间的

^① Asia Development Bank, *Asia Economic Monitor 2008*, Figure.19, Figure.23, p.11-13.

^②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0*, ADB, p.7.

^③ R.Mckinon, *Exchange Rate under the East Asia Dollar Standard: Liv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IT Press, 2005.

^④ John Williamson, “A Currency Basket for East Asia ,Not Just for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s, Number PB 05-1, August 2005.

政策协调。^①

区域金融稳定必须依赖成熟稳定的金融体系,在霸权国家不能有效提供稳定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的现实条件下,地区国家要紧密合作,建立地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建设本地区的外汇储备基金库,以有效地管理和应对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冲击。危机后,东亚国家一直在区域金融建设上积极合作,金融合作走在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前列。在两次金融危机中都遭受巨大冲击的韩国在区域金融合作进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催化和推动作用。如在韩国的积极推动和中日两国的大力支持下,《清迈倡议》最终成功,可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监管与资金支持机制的基础,是中日韩共同引导的区域金融合作成功的一个范例。

此外,东亚区域要继续加强亚洲的债券市场的建设,亚洲债券市场规模与整个地区外汇储备并不匹配,债券市场规模不过20亿,但是地区总的外汇储备却高达3万亿美元,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缺少稳定的投资渠道,所以应该开掘的一个重要市场就是债券市场。拥有地区最多外汇储备的中日韩三国可以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上主导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逐渐建立起本地区成熟而发达的债券市场,丰富地区金融产品,有效规范和管理短期流动资金,为地区企业提供融资保障和资金支持,减少区域金融动荡。面临剧烈动荡的全球金融环境,共同维持稳定的地区金融体系,将是东北亚三国为地区提供的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二) 能源环保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能源安全与环境优化

1. 能源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能源安全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区。2008年中日韩三国合计能源消费共27.5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总量的近25%。据预测,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2010-2020年,东北亚地区能源需求增长将占到全球增长的一半以上。^②中日韩均为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结构都很不合理,3/4来自地缘政治状况极其复杂的中东地区,而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穿过海盗猖獗的马六甲海峡。因此,能源安全面临极大考验。有评估显示,日韩两国是世界上能源供应最不安

^① 高海红:“当前全球美元本位:问题及东亚区域解决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6页。

^② “中日韩应联手解决能源困局”,《环球时报》,2009年11月22日。

全的国家，而中国将在2015年后成为排名第四的能源最不安全国家。^①

长期以来，东北亚三国在石油战略上往往是一种恶性竞争的状态，比如中国和日本在俄罗斯输油气管线上的竞争，造成了双输的结果。中日韩在能源领域各有优势，具备较高的互补性，有着较多共同利益，合作的效益远远大于竞争。日本不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优势明显，并早就建立了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而且还在储备煤炭，在能源外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清洁利用煤炭技术方面有一定的长处。日本向高度依赖煤炭能源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煤制油、煤炭高燃烧及发电技术、煤炭燃烧污染控制技术、煤炭燃料废弃物处理技术等，帮助它们更合理地开发和更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既有利于缓解东亚地区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又有利于东北亚地区各国共同家园的清洁。“韩国在石油储备上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炼制能力也比较强，在节约能源、市场运作等方面也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而中国在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油气勘探技术等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是能源生产大国，而且目前依然是日本、韩国重要的煤炭供应国，且对先进的新能源和节能技术需求大。中日韩三国能源合作基础广泛，潜力巨大。具体而言，中、日、韩三国可在能源供应安全、能源运输安全、能源使用安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开展合作。”^②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能源第一大消费国，^③日韩则是世界第三、第六位的石油消费大国，三国必须通过积极对话，商讨如何加强石油输入国和产油国讨价还价方面保持步调一致，消除“亚洲溢价”。为确保石油供应，三国可以共同与俄罗斯建立起密切的能源联系网络，有效协调四国的能源政策，并作出合理的分配。中日韩也可以考虑组成国际财团共同参与俄罗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和上游资源开发，考虑建立中日韩俄四国联合石油储备体系，^④有效促进和加强东北亚国家之间能源安全与合作。

中日韩三国在油气资源储藏丰富的东海海域存有主权争议，在现有条件

^① K.Wu, C.Morrisson, “Energy Security Index ,” in Wu and Fesharaki (ed.), *Asia's Energy Future : Regional Dynamic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East and West Center, Honolulu, p.208. 参见刘舸：“东北亚能源安全局势与韩国的战略选择”，《当代韩国》，2009年夏季号，第7页。

^② 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挑战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59页。

^③ “China overtake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IEA, 20 July 2010, http://www.iea.org/index_info.asp?id=1479.

^④ 徐斌、黄少卿：“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下，政治协商和外交谈判并非一定是解决东海问题的最佳途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或可成为三国能源安全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在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上信息共享，利益合理分配，既有利于缓解紧张的资源竞争，又可为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奠定基础，进而为东北亚能源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创造政治条件。

2. 环境气候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环境优化

随着东亚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工业带来的污染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家边境，一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往往对地区国家构成严峻的挑战，环境问题成为需要地区国家共同治理的一个紧迫课题。

在环境保护合作中日本处于“最优环节”供应者的地位。日本一向注重环境外交，利用自身技术和资金优势，领导地区环境保护与环境合作，并在国际环境治理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对《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贡献显示了其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领先地位。日本与其邻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多边环境协议。日本自1991年起开始筹划建立亚太环境会议（ECOASIA），注重长远的生态意识、生态合作、生态科技以及生态政治联系等。在亚太环境会议基础上，日本还倡导中日韩三国环境部（局）长定期举行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谈（TEMM），并达成了TEMM机制化、举办促进三国环境教育协作（TEEN）研究会和探讨恢复中国西北部生态系统等三国对等合作关系的共识。^①在日本倡导和各方努力下，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ESCAP）和东亚酸雨预警监视网（EANET）等机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环境合作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国则在区域环境领域合作中处于“最弱联系”的供应者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正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发展对地区环境的压力是巨大的，从空气污染的跨境扩散到因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从向东海、南海等海域的污水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和渔业破坏到湄公河流域的大坝建设带来的弊端，都会深刻影响到区域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区域环保合作中的作用是区域环境优化重要且薄弱的一环，中国对区域环保的贡献直接决定区域环境这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整体供应水平和质量。

^①『日中韓三カ国環境大臣会合（2001年4月）プログ्रेसレポート』，转引自吕耀东：“试析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为中心”，《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第7页。

认识到地区环境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也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问题，在国内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谈判与机制建设，努力推进地区与全球环保合作，在环境问题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解决发展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外部性影响，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展开了区域环境合作，如与韩国和蒙古在防治沙尘暴和沙尘暴监测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韩国也建立了对应的环境合作多边组织，如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组织(NEASPEC)用来解决中国对空气的污染，东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 则是为应对中国对黄海的水污染和保持东北太平洋水生物完整性。

正如在金融领域合作进展所表现出的那样，在金融危机的外部推动力以及区域国家合作需求与合作理念的提升所带来的内部推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政治安排越发有利于转向内部合作和融合，地区认同的加深与地区合作的深化呈现出相互促进之势。地区气候环境具有典型的纯区域性公共产品性质，该领域合作有着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现实需求，需要区域各相关国家以“全体平均”、“最优环节”、“最弱联系”等多种方式的合作来提供，从技术转让到资金支持，从共同研发合作到市场推广，从地区气候环境机制的创建和完善到最终地区环境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地区环境气候合作前景远大，空间无限，也将会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

有人预言东亚区域内最有效的环境合作还将在双边或三边层次上。^①诚如是，有着先进环保科技和丰富经验的日本、最大环境治理需求的中国以及有着较多多边组织合作经验的韩国必将是东北亚地区气候环境合作的领导力量。现今的东亚地区环境合作是在东盟地区论坛 (ARF)、东亚峰会 (EAS)等机制的框架下运行的，还有其他一些次区域组织的补充和参与，往往停留在松散的论坛层次。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环境变化和生态环保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中日韩在地区气候环境的合作应致力于机制的创立和创新，为地区气候环境治理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① Richard Cron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Environment Dilemma," In Richard Cronin and Amit Pandya, Henry L.(eds.), *Exploiting Natural Resources: Growth, Instability,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Stim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2009, pp. 63-81.

(三) 经贸合作与区域性公共产品——开放的市场、经济增长与繁荣

1. 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区域性公共产品——开放的市场

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之一。在东亚，中日韩近年都从WTO贸易自由化建设转向以双边FTA为中心，这就使处于各个发展水平的东亚国家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伙伴来进行经济整合。近年来，东亚各主要经济体（中、日、韩以及东盟的新加坡）已经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形成“轴-辅”（hub-spoke）状的FTAs格局。

表3. 东亚FTAs统计（截至2009年6月）

谈判主体	结 束	谈 判 中	提 出	总 计	范 围	
					东亚内部	东亚外部
ASEAN	5	2	2	9	6	3
中国	10	6	7	23	9	14
日本	11	5	4	20	12	8
韩国	6	9	8	23	9	14
新加坡	19	10	4	33	9	24

注：
 1. 东亚区域范围仅指东盟十国和中、日、韩。
 2. 东亚峰会自由贸易区（ASEAN+6）算作东亚区域内FTA。
 数据来源：根据ARIC (<http://aric.adb.org/FTAbByCountryAll.php>;
<http://aric.adb.org/10.php>) 综合计算得出。

作为地区内经济贸易大国，中国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最早于2001年提出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规划。2010年1月1日，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亿美元贸易额规模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①成为世界第三、东亚地区最大的自贸区。这是东亚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进展，必将对东亚地区其他组别的FTAs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

^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机遇与挑战共存”，新华网，2010年1月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01/content_12734038.htm。

和激励作用。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积极参与双边EPA/FTA谈判的国家之一，日本热衷签订FTA的目的在于为其发达的制造业创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自2002年以新加坡为突破口从多边主义贸易合作转向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合作，在地区内积极施展经济外交，显现出其欲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雄心。

韩国启动稍晚，但自2007年开始与美国的双边自贸区（KORUS FTA）谈判后，便成为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的催化剂，并担任桥梁角色。根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在2008年对505个公司进行的调查，累计有74.1%的受访单位认为应该与中国，67.7%认为应该与日本开始或继续FTA的谈判（按照早期谈判的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的调查，各为100%，总300%。）。^①在FTA建设方面，中日两国是受韩国企业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国家。

“中日韩三边FTA(CJKFTA)或是三个双边FTA的建成是东亚自贸区(EAFTA)建成的前提条件。一旦CJK FTA（或至少一组双边FTA）建成，就可以与‘10+1’ FTAs以‘舒适’、‘协调’为原则的各种机制联系起来，并为‘10+3’成为正式制度协议打下坚实基础。”^②这将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亚开行2009年年度报告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加强区域内贸易(特别是成品)可以帮助减少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过度依赖对工业国家出口，可以提供短期内恢复和长期增长另外的发动机”。^③在金融危机造成经济下滑，诱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中日韩作为经济贸易大国，加强区域自贸区的建设，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择。”^④中日韩在领导区域自贸区建设和保障自由开放市场等问题上可以紧密合作，为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

2. 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经济增长与繁荣

东亚地区十分依赖外需。地区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的大约1/3来自美国。对

^① Inkyo Cheong, Jungran Cho,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on Busines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sia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56, p.29.

^② Masahiro Kawai, Ganeshan Wignaraja, “Asian FTAs: Trends and Challenges,” ADBI Working Paper, No.144, August 2009, p.25.

^③ *Asia Economic Monitor*, December 2009, ADB, pp.44-45.

^④ M.Kawai and G. Wignaraja,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 in Asia,” In Richard Baldwin and Patrick Low (eds.), *Multilateralizing Regionalism: Challenges for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美国出口消费品获得的附加值，占东盟和中国出口商品附加值的70%左右，占日韩的60%左右。^①全球金融危机中，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在2009年上半年出口商品和服务量下滑了7%，由此引起的经济收缩达到3.2%，GDP连续三个季度下滑，外部冲击还造成个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②日本自2008年下半年出口增长降为负值，出口对GDP贡献为负，2009年年中达到负值极点。^③由于国内消费的低迷和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的相对优势等因素，外贸形势并不乐观，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日本经济可能再次陷入长期低迷。中国经济虽在2009年取得了8.7%的增长，但也受到出口下滑的拖累，2009年前7个月商品出口下降22%，全年外需对GDP贡献率为负3.9个百分点。^④金融危机下外需萎缩对三国经济影响十分严重，对外需的依赖严重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持续而稳定的增长为东亚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了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是复苏和增长的引擎”的假说，认为中国已成为“以贸易为本的区域实体经济融合的活力中心”。^⑤在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滑坡的背景下，中国强劲的需求给东亚地区提供了一个广阔而不断增长的市场。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日益紧密，中国日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核心力量。这将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应者，并在引导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东亚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不合理和区域经济体内部结构的一些重大问题。东亚国家长期依赖欧美市场，获得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使本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转型缺乏动力，这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并不利。“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资本结构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互补性，开展合作的潜在空间巨大。”^⑥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分别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中国有着潜力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日本具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工艺，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 Asia and Pacific*, 2009, p.36.

^②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9 Update*, ADB, p.92.

^③ 详见 *Asia Economic Monitor*, p.34, Figure 52.

^④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09 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⑤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9 Update*, ADB, pp.40-41.

^⑥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and Archanun Kohpaiboon, “Intra-Reg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The Decoupling Fallacy, Crisis, and Policy Challenges,” ADBI Working Paper, No. 177, December 2009.

特别在新能源、新材料等能源环保领域内可以提供先进的技术，为区域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作出贡献，还可赢得广大的市场；而韩国则在通信、造船、汽车等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中国在贸易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转向比较发达亚洲国家转移产品的一个长期趋势，而这些国家则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①中国在地区产业分工中开始取代日本、韩国以及其他 NIEs 等较发达经济体所转移的产业，如今很大一部分亚洲制造的产品的最终组装在中国进行。

日韩通过在国际贸易中进口高级资本产品、授权以及其他手段等方式，试图通过直接对外投资，促进技术转移以绕开外国所有权，减少生产成本。有研究显示，中国 FDI 的流入与其他东亚国家的 FDI 流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中国每增加 10%，这些国家就会增加 2%-3%^②。还有研究者注意到积极的“中国效应”，“中国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为东亚其他国家创造了零部件生产和最终组装专业化的新机遇”。^③

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升级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需求的不断扩大，不但帮助日本摆脱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低迷，也使韩国可以享受连年对华贸易顺差的溢出效益。如今，中国面临着重要的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而韩国则正处于从中等发达国家走向更发达的关键阶段，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中日韩三国间呈现垂直与水平产业分工并存的复杂局面，并出现积极的竞争与不断整合之势。加强区域内产业分工合作与贸易可以帮助东亚经济体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可以提供短期经济恢复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三国合作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进而为区域提供公共产品，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① Yin-Wong Cheung and Kar-Yiu Wong, *China and Asi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teractions*, Routledge Taylor&Fracis Group, 2009, p.24.

^② C. Busakorn, K. C. Fung, H. Iizaka, and A. Siu, “The Giant Sucking Sound: Is China Diver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Other Asian Countri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Fall 2004, Vol. 3, No. 3, pp.122-140.

^③ Athukorala, “The Rise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Export Performance: Is the Crowding-out Fear Warranted?” in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July 2007; M. G. Plummer, and D. Cheong, “FDI Effects of ASEAN Inte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s Free Trade Optimal in the 21st Century?” Brandeis University, Waltham, 15 June, 2007.

四、结 语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变革的形势下，地区安全与繁荣作为稀缺而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需要区域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重要国家领导下的区域化合作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应的出现有着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主导力量的乏力和霸权国的衰落等因素导致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使区域一体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东亚区域合作进展变得缓慢。作为地区内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国家，中日韩在经济合作中承担着区域性公共产品供应者的角色，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动力。

“地区（或全球）危机促使被危机所侵袭的区域相关国家共同寻求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危机还强加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以时间紧迫的压力，从而有助于区域合作协议的很快达成。”^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中日韩三国推动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对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稳定和信心的维持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今后三国还将在领导地区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上居于重要地位。

外需的下滑使东亚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大受打击，在金融危机未完全结束和世界经济未完全企稳的现状下，东南亚国家无法保证市场的开放，有的甚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就需要东北亚三个贸易大国更加紧密合作，对抗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保证市场的开放。

维持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能源与环保合作是中日韩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切身利益所在，三国在经济合作中产生出积极的溢出效应，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区域一体化增添了活力。

^① Kent Calder, Yue Min, “Regionalism and Critical Junctures: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Gap’ in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 Studies*, Vol.4, 2004, p19.

China's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People-to-people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ZHAO Minghao

Strengthening People-to-people links has been attached much more emphasis by China since “new typ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as proposed in 2006. This tre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policy reorienta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that is continuously shifting with changing Chinese priorities and increasing African agency in the partnership. However, the explo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actors in Africa, the misperception of African civil society towards China, and the vilification of China by the West pose main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people-to-people link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include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systemic monitoring of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by the ordinary African peopl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legal complianc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alogues between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from China and Africa, and the inclus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third sides in the China-Africa 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Northeast Asian Three Countries and the Supply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 Tak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 Background

WANG Shuang

After the Asia Financial Crisis, the East Asian intergration proces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slowed down for a whil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ASEAN which is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process is not able to provide essential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vitaliz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either from the ability or from the will. Under the tremendous shoc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ir 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ld play a role in providing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become the new impetu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explain the new economic progresses of PRC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und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rtance that the three countries can provide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fields

such as financial trad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ng et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Arctic Council

LI Weifang & WU Di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bate over rights in the Arctic regions among coastal and world's major countries, the Arctic issue has rapidly become a hot spot of global concern.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also give active responses towards this issue .Given that the Arctic Council, a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nsisting of eight Arctic countries, plays a significant leading role in Arctic affairs, by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work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Arctic Counci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mainly refer to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ncil and also proposes the suggestions on this basis to promote these countries' position and their role in Arctic affairs.

G20 Construction and Its Role after Crisis

CAO Guangwei & ZHANG Xia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established a new informal dialogue regime of important advanced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al system. The G20 mechanism gradually formed a regimes structure of "leaders' summit - coordinators meeting -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working group meeting".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the role of G20 mechanism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from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preventing financial crisis, to cop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conomic crisis and restor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crisis, the G20 mechanism will b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create strong,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global growth, from cop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